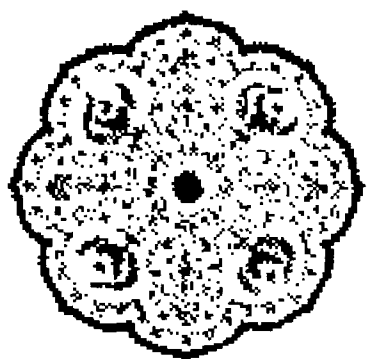


拜根兴 / 著

七世纪中叶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七世纪中叶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拜根兴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拜根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5004-3891-5

I. 七… II. 拜… III. 中朝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唐代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996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和内人月霜初次访问西安时认识了拜根兴君，当时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讲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年轻、诚恳而有朝气的学者。在敬佩的史念海先生、黄永年先生、马驰先生等安排下，我们参观古迹时，拜君是向导之一，使我们学习不少。此事距今虽然已经是将近十年，但是宛若昨日，时常感念。近十年间，我们经常有书信往还，从中得知拜君要到韩国留学的讯息时，说实在的，有点惊讶。因为一般说来，中国人的留学愿望，通常是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地，但是到韩国，因为语言、就业等问题，对中国人而言难度较高，所以前往留学者较少。去年六月，拜君告知我已经通过庆北大学校的博士论文的第一次答辩，可望于八月获得博士学位，真是让人高兴的讯息。而今又听到他的博士论文已经获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此时除了兴奋之外，又有几分惊讶。惊讶的是出版社决定神速，似乎说明大陆出版界已经相当重视中韩关系的学术著作，对学界而言，无疑的是一项福音；对出版社本身而言，可谓有远见，都值得庆贺。

我个人早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大学时期，受到徐先尧教授讲授“日本史”的影响，即开始关心东亚历史关系。具体进行研究，是在一九七三年到日本东京大学、一九八一年到韩国汉城大学以后的事了。在日本、韩国进行研究时，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两国的东洋史学者治学领域广阔，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西嶋定生、池田温等，韩国的李丙焄、高柄翊、全海宗等，其关注的领域是整个东亚的历

史，使我忽然变得渺小了。后来虽经发愤图强，由隋唐教育史出发，进而从事东亚教育史研究，仍觉得起步太晚。西嶋定生先生提出东亚的中国文化圈说，是由汉字、儒教、律令、佛教等四项共通要素所构成。后来我再补了一项科技要素，成为五项要素说。若从这角度来从事传统中国历史研究时，凡是属于五要素的任何一项研究，似都可以看做是东亚史的研究。这是我二三十年来的体认，虽作了一些耕耘，但是在学术界里，一路走来仍然感觉孤寂，尤其在东亚古代史方面。如今得以阅读拜君的研究成果，忽然发现有了知音者，其欣喜何似！所以拜君要我写序时，感到责无旁贷，而有必要赶快推荐给学界，以饕读者。

说到天下秩序，从殷周经秦汉到隋唐时代，才有完备的展现，而行用至明清时代。一般说来，天下秩序宜分为两个层次来思考，一是平时，一是战时。平时比较具体的表现，是在于册封与朝贡关系，但是又可分为有封有贡、无封有贡，以及无封无贡等情况，如何来对应，就须看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定。战时，又可分为天子亲征、命将出征等不同情况，战争形态也随之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整个天下，包括中国本土在内，实际可区分为内臣、外臣以及不臣等三个同心圆层次。随着时代的不同，同心圆结构内部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传统的这一套政治理论，也成为周边国家袭用的依据。于是在大天下之内，又有小天下或小中华世界的出现。

这些历史现象，其实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实际的国力较量与社会差异等问题，不像国内制度较有文献可征，容易找到解答。或许这种缘故，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通常只由文化交流说明其影响，或由军事观点说明其胜负结果等。至于平时政治秩序运作层面，除册封与朝贡问题偶尔会受到注意，其他的秩序问题，则较少涉及。例如国书内容的分析、涉外机构功能的探讨、使臣往还的任务，乃至传统政治理论如德、礼、政、刑等要素的运用等，尤其礼、刑的作用，则殊少注意。因此，常以“武功”、“经营”等字眼概括说明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不感到意外。相对的，外国学者

对于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较感兴趣，其研究成果也较为可观。只是因为立场关系，不免各有所偏执，这是自然的事，无可厚非。不论何者，既曰历史研究，一切仍须回归历史，也就是以史料为据，再作解释，这是最起码应有的共识。至于批评历史，事涉现代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就不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了。

拜君此书共分绪论、上篇、下篇及附篇三章、附表五种、参考文献等，全书约有 22 万言，洋洋大观，精辟论述，随处可见。文中除详加征引基本传统文献而外，又善用出土石刻资料，广罗近人研究成果，尤其韩国学者著作，而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说服力强，允称佳作。相信此书的出版，除嘉惠学界外，必能引起国人对中韩关系更多的关怀。书中具有启发作用的重要论点，例如对唐高宗的《与百济王义慈玺书》分析，关系到新罗金法敏入唐举讼百济事件。利用《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说明嵎夷道行军总管辖下军队编排问题，并重新检讨苏定方的角色与身亡问题。重新检讨文武王金法敏《答薛仁贵书》有关罗唐所谓密约问题，以为由诸多相关史实看来，断定无此事。有关金仁问七次入唐的角色问题，学界的研究并不充分，乃详考其事迹，探讨其与唐朝的亲密关系。关于罗唐战争，双方妥协结果，应该说没有严格意义的胜者或败者，双方都达到预期的目的。透过《刘仁愿纪功碑》、《刘仁愿等题名》摩崖石刻，探讨其出身与经历。对于薛仁贵在半岛活动情形，也有专章讨论，推测总章二年薛仁贵出任首任安东都护，同时对薛仁贵《与新罗王金法敏书》及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答薛仁贵书》再作检讨。另外，对韩国新发现《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也作了解释。附篇介绍韩国古代金石文研究概况，综论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五十年关系，考察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墓志铭等。

唐朝与新罗共同灭亡百济、高句丽以后，朝鲜半岛的情况反而成为唐军与新罗兵戎相见的窘境，恐怕是唐朝始料所未及。论其缘由，拜君指出除唐朝的西北受到吐蕃的威胁而影响其对朝鲜半岛的决断以外，起初实有忽视新罗自主统辖半岛的意识，以及战后未予

新罗较高的政治位阶而导致反弹有关。其后，唐朝显然经过一番修正，终于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此即半岛秩序由新罗主导，但须加入唐朝天下秩序并尊重唐朝宗主国地位。这样的看法，应该是较为得实。

由于探讨传统中国对外关系时，尤其在政治、军事方面，必然会遇到不对等关系问题，就今日看来是很伤感情的。因此，如何作客观的论述，实是治史者必须谨记在心的课题。要达到史学的客观论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下列二事宜加留意：一是以史料为据，一是史学非为行事工具。总之，让历史归历史，这一点，拜君在行文当中，都能谨守分寸，可引人入胜。是为序。

高明士

2003年4月2日

序 二

伴随着韩国经济的起飞，各国学者对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向纵深拓展。而 1992 年“首届环太平洋韩国学国际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檀香山）的举行，则标志着当代一门独立的学科——韩国学（或称朝鲜学）的正式形成。我国学术界对此新兴学科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获得令中外瞩目的成果，并出现一个不断壮大的学者群体。陕西师范大学东北亚历史研究所的拜根兴博士就是此学者群体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则是韩国学和中韩关系史研究中最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之所以说拜根兴博士是我国学者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很早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拜君就读硕士学位之时，就在导师赵文润教授指导下，撰写了一部名为《唐宪宗》的书稿，该书被纳入“隋唐历史文化丛书”中，由三秦出版社 1992 年正式出版，受到唐史学界的广泛好评。其 1990 年获硕士学位后，又以品学兼优留唐史研究所作专职科研人员，并兼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工作。其后，接踵发表了数十篇在中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有关唐代历史文化的论文，承担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李学勤等主编的《长江文化史》的某些篇章的撰文和绘图工作。其二，他是我国自韩国留学归来的首位也是仅有的一位新罗史博士。1998 年，正值其事业有成（1997 年已晋升为副教授）如日中天时，却在专

业上另辟蹊径，毅然辞别贤妻爱子，远赴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校，师从著名新罗史专家朱甫墩教授攻读新罗史博士学位。一个不通韩语，且已过“而立”之年的人，竟只身异域他国求学，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克服多么大的困难！然而，对于有心人，数年寒窗苦读，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他不仅过了语言关，在国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且其博士学位论文，也获得了由韩国权威学者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顺利地取得了博士学位。

即将刊出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书稿，就是拜君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这是一部在研究对象、角度、方法上颇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专著。

首先，在论述对象上，著者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韩国学者盛赞朝鲜半岛上自檀君开国具有 5000 年文明史，因而国际学术界将韩国（或称朝鲜）的历史作为韩国学的最主要研究对象。但截至七世纪中叶之前，朝鲜半岛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只是在新罗文武王（661—681）时代，才结束了朝鲜半岛上三国分立的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若非借助于宗主国——大唐的外力干预，又何能在不到十年时间内（660—668）次第灭亡百济和高句丽！精明的著者紧紧地抓住半岛统一史上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从而破解了朝鲜半岛统一史上的最前沿问题，实在是高明之至。

其次，在研究角度上，著者打破了中韩两国学者各说各话的局限。因为其留学韩国前就已经有相当的专业功底，所以洞悉中国学界的研究动态（书稿中参考引用百余名中国学者的数百篇部论著）。同时，又因著者频繁地参加韩国境内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广泛地接触韩国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故熟知韩国学界的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书稿中参考和引用 50 余位韩国学者的 39 部专著、100 多篇论文）。如此难得的主客观条件，使得著者具备了兼收中外成就，综合百家之长的优势，进而构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这正是《研

究》一书中每个篇章乃至字里行间充溢着新观点、新思想、新信息的原因所在。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重大突破。我国学者因受客观环境的制约，在韩国史的研究方法上，往往只局限从本国正史中和新发现的金石资料中寻找研究答案。如我撰写过数篇百济人物考证文章，由于不掌握韩国本土资料，所以论文在韩国发表后，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之中，担心班门弄斧、贻笑大方。而拜君的研究就不存在这方面的疑虑。他旅居韩国四年之久，不仅有时间和条件熟读韩国侧的史书和金石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高丽史》、《海东绎史》、《东史纲目》、《大东金石目》、《韩国金石全文》、《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证》等，而且还有机会实践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到韩国各地考察风土人情和文物遗址。由于中国侧的古韩国史料早已在著者的掌握中，所以书稿中随处可见中韩两国史料互证的明显特征。这种研究方法的突破，无疑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此外，著者还填补了诸多中外学界研究的空白。如对苏定方、刘仁愿等人物的生平及在朝鲜半岛的事迹考证和评价，中外学者就罕有如是专题探讨研究。

作为忘年交，我同拜根兴博士有着不解之缘。我调入唐史研究所工作，恰是拜君留所任职之时。彼此相处，关系极为融洽。后来我接替牛志平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早已是学会秘书处秘书的拜君，以娴熟学会事务，给我以极大的帮助。更有意思的是，因应邀参加韩国学术会议的需要，我不得不试着写点有关韩国史的文章，拜君又正忙着准备赴韩国留学。陕西师大鉴于出国留学人员多不归来，人事部门迟迟不愿批准拜君的出国申请。因我深知拜君的为人，就以兼任所里行政负责人之便，同人事处签订军令状：若拜君学成后另谋高就，可扣我三年工资，以弥补学校的人才流失。更巧的是，当拜君学成归来时，已退休一年的我，被聘为西安社科院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心挂名负责人还不到一个月，因我的极力

推荐，拜君亦被聘为该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这就是缘分。

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朋友所托，虽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所以当交情深厚的拜博士要我为他的大作写序时，虽明知自己不善此道，但为了不辜负朋友的厚爱，竟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马驰于八方书斋

2003年3月23日

目 录

序一	高明士 (1)
序二	马 驰 (5)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的天下秩序与罗唐关系史	(1)
第二节 罗唐关系史研究综述	(5)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方向	(11)

上 篇

七世纪中叶唐朝与新罗的关系

第一章 新罗真德王时期的对唐交涉	(23)
第一节 真德王时期对唐交涉的背景	(23)
第二节 金春秋的入唐及其活动考	(27)
第三节 金法敏的入唐及其活动考	(30)
第二章 新罗与唐朝联合及对百济的征伐行动	(39)
第一节 战争发生的时间问题钩沉	(39)
第二节 岬夷道行军总管所辖军队的编制问题	(48)
第三节 苏定方与对百济战考论	(51)
第三章 新罗文武王时期的对唐交涉	(64)

第一节	文武王前期(661—668)的对唐交涉	(64)
第二节	文武王后期(669—681)的对唐交涉	(75)
第四章	金仁问的交涉活动研究考论	(86)
第一节	金仁问七次赴唐时间问题考	(86)
第二节	金仁问的政治立场	(87)
第三节	金仁问的在唐活动及其结局	(91)
第五章	罗唐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96)
第一节	罗唐战争关联的史料再检讨	(96)
第二节	战争期间的交涉及其交涉性质	(104)
第三节	有关罗唐战争结果的议论	(112)

下 篇

从唐朝赴朝鲜半岛将军的行迹 看七世纪中叶的罗唐关系

第六章	苏定方的活动及行迹	(123)
第一节	苏定方的生年考辨	(123)
第二节	苏定方的生平考议	(128)
第三节	苏定方之死的新考察	(135)
第四节	“苏定方被杀说”质疑	(138)
第七章	刘仁愿的活动及行迹	(148)
第一节	刘仁愿及《刘仁愿纪功碑》	(149)
第二节	唐留守军和刘仁愿的作用	(152)
第三节	刘仁愿和刘仁轨	(158)
第四节	罗济会盟中的刘仁愿	(160)
第五节	《刘仁愿等题名》中所见刘仁愿的行迹	(164)
第六节	刘仁愿的结局	(168)
第八章	薛仁贵的活动和罗唐关系	(177)
第一节	薛仁贵研究现况	(177)

第二节 薛仁贵在朝鲜半岛诸问题考论	(188)
第九章 柴哲威与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	(201)
第一节 《精舍草堂之铭》的发现及铭文	(201)
第二节 《精舍草堂之铭》碑石形态等问题的再认识	(203)
第三节 《精舍草堂之铭》所见柴哲威事迹	(207)
结论	(212)

附 篇

第一章 朝鲜半岛古代史关联的金石文的现状	(217)
第一节 中国历代金石文的整理研究概况	(217)
第二节 朝鲜半岛古代史关联的金石碑志文现状	(221)
第二章 激荡 50 年——高句丽与唐关系研究	(242)
第一节 唐朝的建立及高句丽的应对措施	(243)
第二节 唐丽战争的原因及战后双方关系	(249)
第三节 “骚扰政策”与唐高宗半岛体制的形成	(253)
第四节 罗唐联合与高句丽的灭亡	(257)
第三章 高句丽遗民高足西墓志铭考释	(270)
第一节 高足西的主要事迹	(271)
第二节 高足西何时归唐	(272)
第三节 天枢建造与高足西	(274)
附表	(281)
表 1 金石墓志所见七世纪赴朝鲜半岛唐人军将 行迹	(281)
表 2 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及朝鲜半岛关联造像 题记石刻	(291)
表 3 七世纪中叶唐与朝鲜半岛关联军事行动统计	(294)
表 4 七世纪中叶新罗赴唐使节行迹	(298)

表 5 七世纪中叶唐赴朝鲜半岛使臣行迹	(304)
参考文献	(309)
英文提要	(332)
后记	(336)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的天下秩序与罗唐关系史

首先，唐与新罗的关系缔结发展，是在七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如何把握驾驭此一时期东亚国际形势发展的总局面，成为此一时期罗唐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界首先对此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且多样化的讨论。如著名学者西嶋定生就提出“东亚世界论”或“册封体制论”。认为：当时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由统一的汉字、律令、佛教、儒教等组成的文化圈。之所以以中国为中心，是因为东亚诸国均接受中国中古时期诸王朝的册封，并承担朝贡的义务。西嶋定生的观点提出后，在日本学界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当时著名学者堀敏一、旗田魏、鬼头精明、石母田正、菊池英夫、江畑武、布目潮沅等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批判西嶋定生的学说，进而使以东亚世界为中心的学说步入多极的局面。但无论如何，西嶋定生提出此理论，对于总体把握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脉络，在当时学界乃至对此后东亚古代官系史研究走向深入，其重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此同时，韩国学界对此问题亦提出自己的观点。著名韩中关系史专家全海宗教授在其大著《韩中关系史研究》中，把以往的韩中关系总结为“朝贡关系”。其首先将朝贡关系的制度和特性加以分类，并且运用统计方法表示出各个时期的特征，即认为从公元 8

年西汉灭亡起到公元 316 年西晋灭亡，是朝贡关系成立的前阶段。公元 317 年东晋建立起到公元 668 年朝鲜半岛高句丽国灭亡止，也就是韩国古代三国时代后半期，是初期朝贡关系的成立。从公元 669 年到公元 1279 年，是朝贡关系的发展期。其中又有朝贡关系的变质期（918—1368），而典型的朝贡关系成立则体现于高丽、李朝与中国明、清王朝的关系上。在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朝贡制度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以及仪礼等的广泛内容虽然已经具备，但愈是后来，其政治的仪礼也就愈形式化，也就愈带有闭锁性的色彩^[2]。而或许金庠基氏专论张保皋海上贸易，即注重经济史研究的缘故，其将这种朝贡关系只是局限在双方经济利益范围之内，对于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方面事实，认为“这种朝贡可从传统中华思想与王道思想中出现的对外政策模式加以理解，其中含有对先进文化吸收及附带的经济意味”^[3]。另外，申滢植氏将三国时代的韩中关系具体化，即按时间先后区分为：唐以前三国对中国的朝贡，三国对唐的朝贡，统一新罗对唐的朝贡，唐的对新罗交涉四个阶段^[4]。徐荣洙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认为：“朝贡关系也是伴随当时中国的势力强弱，是否统一帝国，是否基本理念过多的违背实际状况，以及依据现时代和上代，其性格、强度亦不是一元的或固定不变的。当然，进入三国时代后半期，从史料上看，朝贡关系从形式上渐渐浮现制度化的样相。韩中关系中朝贡关系所占比重相当高，即使一般关系，在文献上以朝贡表现的现象亦不少，故区分一般关系和朝贡关系并不容易。但这种情况，其关系不具备性格及内容的变化，中国史一贯的潮流中固有的华夷观不确实的地方很多。”^[5]除此之外，卢重国氏则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力学关系”。认为：“当时各国内部的矛盾，国际社会间的利害关系，有对立、抗争，亦有维持和平关系等。可以看出，随着形势的变化，各国采取相应适宜的政策，并不是墨守惟一的交涉原则。因而，各国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均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存立或势力均衡，以及追求自身的利益。正因如此，其对外政策的本身可用瞬息